

寻找慈善传统

建国前上海的地方精英与隐贫救济

隐贫救济在上海的兴起

抗战期间,上海的经济社会形势持续恶化,隐贫者数量与日俱增。1940年初,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以下简称“慈联会”)率先开展针对隐贫的救济活动,结果,“连日接到申请救济之函件,日必百数十起”,远超预期,不得不提前结束登记程序。此事引发各界对隐贫这一“严重社会问题”的关注。

实际上,对隐贫群体的定义与救助可以追溯到1921年成立于苏州的“苏城隐贫会”。这是当地一个前清遣民家族创办的佛教慈善团体,以按月资助隐贫家庭、有偿邀请隐贫寒士抄写佛经为主要活动。该会对隐贫者的要求甚高,只有“虽贫至绝无依赖,而始终不失其志”,且“资格高尚,身家清白,不染嗜好,品行端正”的“士商”,才算符合隐贫的标准。1934年,上海普济隐贫社效仿苏州,以写经形式补助隐贫者,不过规模较小,未成气候。抗日战争期间,上海隐贫现象广受关注,苏州隐贫会因开风气之先,亦被提及。它对隐贫者道德的赞美,得到了后来者的肯定与借鉴。

至20世纪40年代,上海报章中尽管不乏“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戏谑评价,但隐贫者多为品德高尚的“智识阶级”,已是舆论共识。人们普遍将隐贫者对自身贫困状况的隐瞒,视作“穷且益坚”贫贱不移的道德象征。1934年,《新闻报》、基督教青年会与女青年会共同举行“寒衣运动”,特意登报呼吁“清高的教师和隐贫”接受救济。此后,隐贫者因受到救济而渡过难关,得以自力更生、正常生活,甚至找机会报答施济者的“佳话”屡见报章,营造出有序、高尚的舆论氛围。

因此,社会对于隐贫的定位与要求,与一般赤贫大有不同。慈联会举行隐贫救济时,特登报声明,“从隐秘着手,或由亲友报告,或本人迳函该会陈述,并得化名”,本会绝对“严守秘密”,此举颇受欢迎。对申请救济者,慈联会将按地址一上门调查,确保对方确实亟待救济而“难于明白乞求者”,才发给米粮。在有些城市,除道德品行外,隐贫还需证明自身的文化水平,如1942年南京市冬赈委员会举行隐贫考试,通过者方可获得救济。

1945年4月,沪上“纸老虎”、纸业巨贾董和甫以“愚斋主人”名义发起隐贫贷金,委托尊圣善会与宁波同乡会代为办理,并在各大报纸刊登启事,“凡隐贫及清寒者当无力订阅报纸,希阅者辗转宣传,从速申请,或协助代办申请手续,功德无量”。一周内,仅宁波同乡会就收到4300余封申请信。由于人数太多,董和甫的两千万善款不敷使用。此外,宁波同乡会还发现,一些不识字的底层贫民并不理解“隐贫”含义,以贷金为以所有穷苦者为对象,也加入报名行列,不少拆字摊闻风而动,做起代写申请信的生意。由于董和甫的名气与此次隐贫救济的影响,“隐贫贷金”迅速成为舆论中的热门话题,引发诸多关于隐贫问题的讨论,救济隐贫一跃“成为今日最时髦的一件善举”,常州、定海、苏州、湖州等旅沪同乡会加以模仿,陆续发起隐贫贷金。

董和甫隐贫贷金事件映射出抗战后期上海隐贫的泛化现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商品的全面统制与物价暴涨,使得上海市民生活更加艰困,隐贫现象日益普遍。当人人皆贫时,“隐”之一字逐渐失去意义,隐贫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加上救济资源极其有限,如何选出更需要、或者说更值得帮助的隐贫,给施济方带来了莫大压力。

在此背景下,隐贫救济逐渐脱离原有的道德语境,演变为对教师、职员等职业体面、领取薪资的城市中间阶层的整体关切,

“隐贫”即“隐性贫民”“隐匿的贫民”。具体指的是受过一定教育、外表体面、内里贫困且不愿请求援助的群体,以教师、职员等“薪水阶级”为典型。1940年前后,“隐贫”一词在上海公众舆论中悄然兴起,成为民间慈善的重点救济对象。抗日战争后期,教师、职员等“薪水阶级”普遍陷入贫困境地,隐贫逐渐被用于指称原先身处城市中间阶层的贫困者,故而对隐贫的关切,具有维持社会稳定的政治意义。



1947年,上海政府分发粮食

救济范围之广,早已超出对道德与文化的要求。如1942年12月《申报》上的一篇社评写道:“我们知道,上海市民,除了极少数富裕者之外,最大多数是上海社会之实际的支持者——薪水阶级,也就是所谓‘隐贫’阶级;次多数就是‘赤贫’阶级。”作者呼吁政府尽快解决粮食与物价问题,否则必将酿成政治危机。隐贫现象也引起汪伪政府的注意,1943年江苏省服务委员会将城区隐贫人士列为本年度冬赈计划的重点救济对象。可见,“隐贫”与“赤贫”逐渐并列,成为贫民的两类主要类型,前者代指贫困的“薪水阶级”或失业人士,后者则是社会底层之贫民。这一趋势对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的隐贫救济及其政治内涵产生了重要影响。

隐贫救济的制度化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的慈善界发生了一项深刻的变化,那就是由政府主导救济体系的确立。受抗战影响,民间善会经济异常困难,显出疲软之势,战后回归上海的国民政府得以借机掌控城市救济事务。新的救济体系主要包括社会局下属的市救济院、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以下简称“行总”)上海分署及冬令救济委员会(以下简称“冬救会”)三大系统。冬救会名义上由政府与地方人士共同主持,但后者多被边缘化,在某程度上可视为一个特殊的政府机构。1948年初,冬救会改组为上海市救济委员会(以下简称“救委会”),从临时组织转为常设机关,具体职能不变。

救委会的长期设立,映射出战后上海经济与社会状况的恶化,救济成为维护发岌可危城市秩序的重要手段。抗战时被反复提及的隐贫问题,也为城市精英所关切。三教道德善议会(以下简称“三教道德会”)的理事庄平即为其中之一。他在市议会积极运作,是隐贫群体得以纳入新救济体系的主要原因。

庄平籍贯上海,1910年前后生人,从事商业,主营印刷生意,抗战期间担任三教道德会理事。在庄平主持下,三教道德会成为抗战期间救济隐贫最活跃的善会之一。1941—1942年间,该会举行了3场隐贫登记活动,兼及孤寡节妇,救济人数近2000名。此后因经济支绌,隐贫登记中止。

善会运营的挫折,使庄平将目光转向国民政府,试图借助政府力量,实现对隐贫群体的救

战后上海第一届,也是唯一一届正式参议会的议员。是年9月,参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庄平提交“请求行总救济隐贫”案,鉴于“本市失业隐贫众多,其颠沛流离之苦,不胜言喻,影响社会实大”,要求社会局举办隐贫登记,救济资源由行总供给。大会后期,以庄平为首的82名参议员还共同发起援助隐贫的临时动议,大会议定将其交由市政府参酌办理。

庄平还利用议员的质询权,力主张将隐贫划为行总的法定救济对象。9月17日,市参议会召开该年度第十二次会议,由行总报告上海地区救济情形。会上,庄平就隐贫问题提出质询:“对于‘隐贫’一类,尤其是清苦的教育文化界人士,为什么有的几次三番申请都得不到救济?”行总方面含糊作答,表示已将贫民救济分为“普通”和“教育文化”两方面办理,也算涉及隐贫救济。

然而,无论是参议会还是行总上海分署,关注重点都在难民与游民,对处理隐贫问题并不积极。庄平的提案最终被并入“拟加强社会救济事业”决议案,该案强调对“自甘下流、毒害社会、影响社会救济”之无业游民的收容,要求市府统筹规划全市救济体系,“庶几社会病态,日能减少”,出发点与隐贫救济南辕北辙。市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召开后的9个月间,官方隐贫救济一直没能真正实行。

由于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国民政府于1947年2月颁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对日用必需品施行限价,并冻结生活费指数,不再上调工资。该案颁布后不久,物价再度上涨,城市贫困问题愈发严峻。在此背景下,5月底至6月初,上海市参议会召开了第三次大会。庄平提交的“请市府迅予举办救济隐贫工作”案得到大会通过,形成社三字第十四号决议案。

如果说1946年庄平的两次提案都是从同情、施善的视角出发,那么新的提案则明确显示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鉴于当时的经济社会形势,参议会承认隐贫救济的紧迫性,庄平的提案终于形成专案决议,对市政府的执行产生了一定的强制力。10月,社会局拟订隐贫救济实施办法草案,经市政会议决议,具体救济事务由即将召开的冬救会负责。隐贫作为外表体面的城市中层得到承认,获得接受救济的合法权利。1947年11月,“赤贫”“中贫”与“次贫”之后,“隐贫”也加入了贫民配米范围。1948年1月,冬救会正式公布《耆老隐贤隐贫救济分配办法》。未久,冬救

会改组为常设机构,隐贫成为官方救济的长期对象。

崇德会推进隐贫救济

除庄平外,抗战胜利后上海隐贫救济的背后还有一位关键人物,即上海中国崇德会(以下简称崇德会)董事孙德全。孙德全,字慎卿,从事法律及会计等业。他是1946年度及1947年度冬令救济委员会的委员,并于1947年前后加入崇德会,担任董事。崇德会是1937年成立的一个佛教居士组织,成员均为江、浙、沪籍商人,以从事棉纱业者为多数,主办施衣、施米、施医药、施材等慈善事务。

1946年底,孙德全以新成区民代表的身份给社会局去信,为崇德会争取冬救会授权,代后者在区里发放救济物资。

囿于经费,崇德会的施米、施麦等主要慈善项目,受济人数在三四百人上下;施药及以隐贫为对象的施材活动,受济人数甚至不到十人,规模相当有限。可见孙氏请愿的最终目的,正在于借助政府(冬救会)的能量,来达成崇德会救助隐贫的目标。

崇德会成为1946年度冬救会施放救济粮的三个代理慈善团体之一,孙德全与冬救会达成协议,“第一批接济义民难民,第二批分配隐贤隐贫”。由此观之,抗战胜利后上海首次出现有官方背景的隐贫救济,就是以冬救会提供救济物资、民间善会代为发放的形式间接完成的。

然而,这种合作并未持续多久,即因1948年初隐贫救济办法的正式推出而出现矛盾。1947年底,崇德会分别致信市政府、市社会局与民政局,试图延续去年旧例,由崇德会代办隐贫救济事务,并附一份列名172人的《崇德会调查隐贫隐贤名册》(以下简称《名册》),请冬救会“查核补助衣食”。1948年1月,《耆老隐贤隐贫救济分配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订立,宣布隐贫的申请途径有二:符合条件者向冬救会书面申请;由民间慈善团体或冬救会委员介绍,每个团体或委员介绍的隐贫名额仅限2至3位。《名册》中的172人远超过数,与《办法》的精神有所抵牾,冬救会以此为由,中止了对《名册》的处理,甚至认定孙氏滥用职权、徇私舞弊。

面对冬救会的“攻击”,孙德全极其愤慨,立刻向市政府上书申诉。孙氏将双方矛盾归咎于私人恩怨,认为自己已去年“力谏”冬救会补发拖欠已久的救济隐贫面粉,得罪了查放组,“崇德会亦因之受累”。在申诉信的末尾,孙德全还附上行总贪腐案的剪报,指控冬救会查放组内部腐败、贪墨物资,将事情的严重性上升到另一个高度。

孙德全此次上书属呈诉性质,需按程序处理,不可按一般公函答复。加上孙氏本年人事已高、受人尊敬,还身兼地方团体主持人、区民代表与冬救会委员等身份,冬救会不得不重视此事,谨慎回应。孙氏上书不久,查放组承认救济物资发放迟缓,鉴于“清济人众”,请孙氏“下察实际,而予原有”,并愿意作出一定让步,“稍为破格”,向其中确系隐贫的37户发放救济。

可以看到,在隐贫正式成为官方救济对象的过程中,孙德全起到了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德全的个人声望与人际网络是一个颇受重视的要素。德全与冬救会发生矛盾,资金问题是根本症结。经费不敷的崇德会试图利用官方资源推行隐贫救济,而冬救会亦“确属艰困”,双方都无法接纳这172的隐贫名单,而政府又对市内救济工作大包大揽,无法真正兑现救济隐贫的承诺。

(摘自《安徽史学》2025年第6期,原标题《1945—1949年间上海的地方精英与隐贫救济》,作者张玉清、刘平)

海外撷英

今年“捐赠星期二”筹款活动(GivingTuesday)取得了40亿美元的佳绩,比去年增长了13%,筹款人希望捐赠者在今年剩余的时间里也能继续慷慨解囊。今年帮助各机构取得佳绩的一些策略可能会被重新调整和改进,以帮助他们在年底也能获得更多捐款。

在许多非营利组织面临财务困境和社区需求激增的一年里,今年的成果令人欣喜,尤其是在各种类型和领域的捐赠都有所增长的情况下,小额捐赠者积极参与。一些平台发现,社区活动尤其成功。现金捐款的平均金额有所增长,股票和其他资产的捐赠也同样如此。至关重要的定期捐赠也出现了增长。

“我们真的希望非营利部门能够继续保持这种势头。”“捐赠星期二”首席数据官伍德罗·罗森鲍姆(Woodrow Rosenbaum)说道,“目前看来,那些有意吸引日常捐赠者的组织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这确实令人鼓舞,因为这意味着存在与支持者建立联系的机会。”

经济不确定性悖论

今年一直笼罩在经济不确定性、政府资金变化的阴影下,许多人担心这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可能会阻碍捐赠。

“我们在‘捐赠星期二’中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这种情况。”罗森鲍姆说道。联邦政府削减开支和经济不确定性的普遍存在,反而可能促使捐赠者更加慷慨地捐助他们关心的事业。

“那些可能导致(经济)焦虑的因素,也同样会激励人们采取行动。”罗森鲍姆说道,“这对人们的积极性和对捐赠机会的响应能力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两个希望共同做出贡献的捐赠团体在“捐赠星期二”期间筹集了超过5万美元。约瑟夫·帕皮克(J.P. Papich)在看到他的朋友劳伦·布里格曼(Lauren Brigman)领导的“100位关爱圣彼得堡女性”组织(100 Women Who Care St. Petersburg)的运作后,创立了“100位好人圣彼得堡”组织(100 Good Guys St. Pete)。他表示,这种集体捐赠的方式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即使在经济困难时期,它也是可行的。

“没有人会为了这件事掏空自己的银行账户。”帕皮克说道,“与其他人一起做这件事,可以帮助我摆脱烦恼,晚上睡得更好,感觉与社区的联系更加紧密。”

筹款平台GoFundMe首席执行官玛格丽特·理查德森(Margaret Richardson)表示,GoFundMe也发现,在这种经济环境下,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开展草根和同伴筹款活动效果显著。

“我们还在‘捐赠星期二’活动之前注意到,我们平台上的基于挑战的社区驱动型筹款活动尤其受到年轻受众的欢迎。”她说,“通过这些方式,各组织能够激活其支持者群体中新的不同群体,从而加深参与度。”

经济状况是GoFundMe用户今年创建的筹款活动中的一个关键因素。该组织的年度援助报告指出,为个人筹款以支付基本生活费用的活动是该平台上增长速度第二快的筹款类型。理查德森指出,在政府停摆和食品福利减少的不确定时期,一些用于支付食品账单的筹款活动达到了顶峰。

这种捐赠的增长速度仅次于对慈善机构的捐赠。仅在“捐赠星期二”当天,GoFundMe平台就为非营利组织筹集了6330万美元,非营利组织的捐赠者数量增长了13%。

大额捐赠者增加捐款

“捐赠星期二”的创立理念是将小额捐赠者聚集在一起,共同发挥影响力。“捐赠星期二”当天,平均捐款金额略有增加,从去年的193美元增至212美元。虽然这不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该活动会密切关注这一趋势。

“我们不希望看到‘捐赠星期二’的平均捐款金额持续上涨。”罗森鲍姆说,“我们认为这不一定是积极的信号。”

尽管如此,鉴于今年股市上涨,人们注意到在“捐赠星期二”当天,大额捐赠者捐赠证券的情况有所增加。筹款平台Every.org总裁艾莉森·法恩(Allison

Fine)指出,今年“捐赠星期二”收到的股票和加密货币捐赠是去年的两倍。

Vanguard Charitable是一家捐赠者建议基金的赞助机构,其首席传播官伊莱恩·凯尼格(Elaine Kenig)表示,自9月份以来,其捐赠者建议基金的捐款有所增加——这可能是受股市上涨和即将到来的税收改革共同推动的,这些改革总体上会使明年的大额捐赠对捐赠者来说不太有利。凯尼格表示,在“捐赠星期二”当天,使用该机构捐赠者建议基金的捐赠者向非营利组织的捐款比去年增加了26%,支持了比去年多23%的慈善机构。

凯尼格说,捐赠增值资产的捐赠者通常希望增加他们的税收优惠捐赠,并提醒人们在年底的最后几周充分利用这一点。

“不要回避讨论为何税收政策改变促使人们现在就捐款。”凯尼格说,“可以此为契机,与他们探讨如何在12月31日之前最大限度地发挥捐款的作用。”

定期捐款和志愿服务

“捐赠星期二”的一个趋势是定期捐款的增加,这将普遍提高组织的收入。理查德森表示,GoFundMe在“捐赠星期二”当天新增的定期捐款增加了20%。筹款平台Bloomerang支付业务高级副总裁埃里克·达希尔瓦(Eric DaSilva)表示,Bloomerang平台上的定期捐款增加了60%。

“这不再是一次性的交易关系。”达希尔瓦说,“这是一种对组织的长期承诺。所以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鼓舞。”

达希尔瓦表示,在定期捐款方面取得成功的慈善机构都专注于与捐赠人建立更牢固的联系。

罗森鲍姆表示,总体而言,今年“捐赠星期二”的志愿服务人数比去年增加了20%。国际扶轮社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梅林(Eric Schmelling)表示,国际扶轮社更加重视“捐赠星期二”的志愿服务,鼓励年轻的专业人士“奉献时间或参与志愿服务”。扶轮社社员被要求记录他们在“捐赠星期二”参与的志愿项目,并在12月10日之前进行汇报。虽然所有结果尚未统计完毕,但初步反馈显示人们对此非常感兴趣。

“我的团队会对收到的反馈进行分类。”捐赠人参与经理斯蒂芬妮·阿多迈蒂斯(Stephanie Adomaitis)说,“我们可以从这些反馈中了解初步情况,他们都非常积极地告诉我们他们在做什么,以及他们的团队将如何一起捐款。”

“捐赠星期二”之后的募捐

随着非营利组织进入年底冲刺阶段,他们有时会担心不断地要求捐赠人捐款,尤其是在这些捐赠人已经在“捐赠星期二”捐款的情况下,会让这些努力显得过于功利,从而降低成功率。罗森鲍姆理解这种担忧,但他表示,关键在于确保为支持者提供多种参与方式,包括捐款。

“我们希望确保我们的互动是一种对话。”罗森鲍姆说,“首先,请务必表达感谢。其次,一定要谈谈您的捐赠人与您一起产生的积极影响。”罗森鲍姆建议提供志愿服务机会、捐赠机会和分享机会——即让支持者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有关您组织的信息。

阿多迈蒂斯表示,国际扶轮社首次邀请成员在线分享他们支持该基金会的理由,并获得了超过2500次分享。此外,该组织制定了一项政策,即在每次募捐之间发送四到五封感谢信或成果报告。这可以避免信息发送过于频繁或显得过于功利。在“捐赠星期二”之前,国际扶轮社在11月开展了一项感谢活动,感谢现有捐赠人、曾经捐赠但已停止捐赠的捐赠人以及从未捐赠过的支持者。

阿多迈蒂斯说:“我们实际上安排了一个月的时间,专门感谢我们不同类型的捐赠人,为他们在12月份多次收到募捐请求做好铺垫。”

她建议其他组织先表达感谢,然后再提出捐赠请求:“无论如何,在‘捐赠星期二’之后提出新的捐赠请求之前,一定要先表达感谢。”

(转自慈善纪事网网站,作者拉什达·柴尔德里斯,高文兴翻译)